

# 离散的认同： 网络社会中现代认同重构的技术逻辑

吴志远

## 摘要

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认同的建构与维系。在现代社会中，主体对自我的认知与理解、对他者的定义和判断、对意义与价值的共享和解读，都将深刻影响到社会共同体的共识基础。网络社会是一个以虚拟技术、流动关系为基本特征的网状社会，在这个人和个人无时无刻不“被连接”的新时空中，过去较为稳定的社会认同正在遭遇去本质和去中心化的技术悖论。在虚拟空间中，他者化冲突的不断放大导致新的认同危机，这种对自我、他者自反性的定义和强化，最终将表现为现代社会中民族国家认同的新命题。网络社会的技术逻辑正在重构这类传统宏大叙事结构的认同样态，使虚拟空间中的民族国家认同由聚合式的中心辐射走向圈层化的离散。理解新的技术逻辑，才能积极地引导网络社会中的现代认同，建构共识性的社会基础与良性的网络社会秩序。

## 关键词

网络社会、技术逻辑、现代认同、民族主义

## 作者简介

吴志远，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电邮：lovewzy@163.com.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青年项目）“沉浸传播环境下新媒体技术对媒介融合的影响研究”（18CXW0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Dispersed Identity: The Technology Logic of Modern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in Network Society

WU Zhiyuan

## Abstract

A stable society needs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identity. In modern society, the Subject's 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itself, the definition and judgment of the other, the shar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meaning and value, will profoundly affect the consensus basis of the community of society. Network society is a society characterized by virtual technology and flowing relationship. In this new space where people are be connected at all

times, the stable social identity is confronted with the technical paradox of "De essentialism"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the cyberspace, the enlargement of otherness conflict leads to new identity crisis, this reflexivity definition and reinforcement of self and others, will finally be a new proposi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modern society. The technological logic of the network society is reconstructing the identity of this kind of traditional grand narrative structure, making the identity of nation and state from convergent central radiation to dispersed of spheres. Only by understanding the new logic of technology can we guide the modern identity in the network society, and constructing the social consensus basis and the order of the network society.

### Keywords

Network society, Technology logic, Modern identity, Nationalism

### Authors

Wu Zhiyuan is an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E-mail: lovewzy@163.com.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project entitled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new medium technology on media convergence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immersive communication" fund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Project (Youth Project) (18CXW020).

网络社会带来了全新的交往方式和行动方式<sup>1</sup>,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流动的现性”背景下的全球全时化传播时代。通过互联网和新媒体, 个体与群体之间被重新组合和连接, “连接”的背后正是塑造新的社会结构的技术逻辑。这种技术逻辑, 概而言之, 即虚拟化、流动化、去中心与去本质。媒介技术的虚拟化使主体性逐渐消融; 时空的流动性带来分散随机的社会交往关系; 符号能指所指的多元错乱使过去稳固的意义价值经历去本质过程; 网络节点的去中心化则在建构一种离散 (dispersed) 的现代认同。

马克思 (2001: 379) 认为, 人即使不是政治动物, 至少也是社会动物。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动物, 总是在同他人的交往过程中产生社会关系的意义生成。正是由于人乃“合群”之物, 经由不同的群体归属, 社会不同组织和机构才得以形成。

认同乃是人们参与不同社会组织和机构的一种基本心理机制, 它基于自我主观和客观的 (即自我所设想或意愿和社会所期许的) 群体归属。同时, 认同也是自我对他者想象的社会心理表现。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 个体通过自我表演、观察他人的表演、参与他人的表演, 实现印象管理。然而, 社会的复杂性正在于, 在这种自我表演与他者表演的过程中, 内容同意义往往并不能保持一致, 手段与目的常常冲突甚至背离。正因为如此, 在建构主体的自我认同过程中, 他者也被

不断建构和解构。

认同建构现代人的意义和经验，因此，它关系到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组织方式。认同并不是一种现代性现象，但显然是现代性的核心议题。曼纽尔·卡斯特（2003：2-3）认为，认同（identity）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认同是比社会角色意义更强烈的意义来源，它涉及到自我建构及个别化的过程。在网络社会里，对大部分的社会行动者而言，意义是环绕着一个跨越时间和空间并自我维系的原初认同（primary identity）（亦即一个架构其他认同的认同）而建构的。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通过即时化的传播工具，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之间似乎有了更多建构认同的可能性。但在技术的交流手段背后，通往共识性的意义不但没有被发现，相反，还在不断被去中心化和碎片化的信息洪流挤兑和稀释。对实用性信息的推崇成为现代社会交流和传播的核心议题，在技术化的交流过程中，现代社会更加追求信息到达的效率，而忽视了共同意义的建构和维系。

认同不仅建构意义和经验，也在重构情感，因此，具体社会中认同的建构和解构，会带来直接的个体情绪和社会情绪的冲突和变迁。意义和经验的共享只有通过情感的共鸣才能发挥其社会性力量。对“我们”的支持，对“非我族类”的恐惧或敌视，对民族国家的拥护或分立，正是这样一种基于共同经验和意义共享后的情感表达。

### 一、虚拟与流动：身份认同的消解

从网络社会的技术逻辑角度出发，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形态，网络社会正通过互联网和新媒体重新定义网络使用者的虚拟身份，并再造人格化的虚拟群体身份。这种诞生于虚拟与流动的技术逻辑下的身份，形成了一种逐渐离散化的认同趋势，放大了他者化的对立冲突，并消解着个体和群体对意义与价值的理解判断。

网络社会结构性的变迁，使身份认同的主体建构、他者建构和意义共享与价值判断也发生了新的特征变化，这三者的结构性变化，正在使传统社会结构中较为稳固的身份认同呈现虚拟化与流动化，使网络空间中的个体与群体身份的主体性逐渐“消逝”于符号的象征体系之外。

#### （一）虚拟身份：自反性的主体建构

身份认同是一个双向互动的主体建构过程，身份认同基于个体或群体的主体性，在社会互动过程中通过不断实现社会期望（角色扮演）而被建构。吉登斯

(1998: 35) 视这种身份认同的主体建构为一种现代性反思性延伸到自我核心部位的表现, 在后传统秩序的场景中, 自我成为反思性投射。他认为, 个体生活中的变换总是需要心理重组, 这在传统文化中常常以过渡的仪式 (rites de passage) 被仪式化。在这样的文化中, 集体层面上的事情代代之间少有改变, 而改变了的认同清楚地处于监视之下。相反, 在现代性的情境下, 变化的自我作为联结个人改变和社会变迁的反思过程的一部分, 被探索和建构。换言之, 在传统社会中, 个体生活中的主体建构依赖较为稳定的社会仪式和代际传承 (如古代儿童的成人礼, 就是一种通过仪式建构主体的过程), 而作为一种现代性的产物, 主体建构本身成为了一种社会参与过程, 人们一方面建构着身份认同, 另一方面也在再定义各类新的主体, 如同性恋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等亚文化群体的主体身份建构, 都是这种再造主体身份的过程。

在网络社会中, 身份认同的主体建构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虚拟主体身份的建构。基于互联网而形成的网络社会使得现代人获得了二重主体身份, 即线下的主体身份和虚拟主体身份。在传统社会中, 人们的言行举止受到严格的社会规范限制, 即使在现代化社会中, 人的自我主体也必须通过符合社会规范来不断建构和实现。网络社会打破了这种社会规范对主体自我建构的规定和束缚, 互联网和新媒体赋予了网络社会中的现代人以多重主体身份, 甚至会形成线下主体和虚拟主体在社会属性上的二元对立。因此, 在网络行动中, 这种虚拟主体建构有时甚至会形成同现实主体建构迥然不同的行动逻辑。

二是虚拟群体的建构, 这是由虚拟主体建构所带来的必然现象, 互联网上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多元群体, 它们基于现实群体而实现, 但本身也构成为网络社会中的一种重要参与主体 (相对于个体化的主体而言), 这些虚拟群体本身也构成为不同类型的行动体 (actor)。因此, 研究网络社会中的身份认同, 须要意识到这类虚拟群体同现实群体的属性区别, 而非用现实群体的属性去解释说明虚拟主体的身份属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网络社会中虚拟群体的主体建构并不是固化的, 它不像传统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群体的主体性建构, 一旦形成, 其属性一般很难改变和打破。网络社会中虚拟群体的主体建构是一个流动的过程, 在不同群体的主体建构过程中, 主体与主体之间也在不断被解构和重组, 由此也带来虚拟群体的主体性不断被再造和重新定义, 正是这种自反性的主体建构, 使得网络社会中的虚拟群体形成一个不断“再标签化”的解构抗衡建构的过程。

例如, 以“屌丝”这一主体建构为例, 该词最早来源于百度贴吧“李毅吧”。



李毅贴吧粉丝被称为“毅丝”，“帝吧”又被称为“D吧”，吧友将自己简称为“D丝”。后来出于其他贴吧成员的恶搞称谓，演变成了“屌丝”。“屌丝”一词最初具有污名化色彩，而出于恶搞、非主流化的文化认同，帝吧吧友认可了“屌丝”这一名词，并让其成为和高富帅相对的“再标签化”的抗争性自我认同。随着青年亚文化的崛起，屌丝的群体身份认同又在大众层面从最初的戏谑污名变为平凡、微小、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代名词。在这种充满自我解构式的社会互动中，虚拟群体的身份认同也变得更加游离，而不再像传统生活世界中那样稳固。

## （二）制造他者：冲突性的放大

身份认同是一个不断定义“他者”的过程。有“我”就有“你”，有我们就会形成“你们”。身份认同一方面进行主体建构，另一方面，通过不断划清界限、区分属性来定义“他者”。对“他者”的定义和诠释直接影响和体现了对自我主体的认知角度和深度。

主体主义哲学曾经在西方哲学史上成为重要的哲学认识论，但随着人类社会步入工业社会，过分强调主体性所带来的问题也使西方世界意识到对主体主义反思的重要性，“他者”问题即是反思主体主义的产物。作为20世纪哲学的重要转向，“他者”问题的内涵是现象学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问题，主体间性的讨论和研究是对主体主义哲学的反思，也即对“我”和“你”截然对立的批判反思。其中，“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主体间性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试图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之内消减“我思”的优越性，承认他人存在的意义，寻找“自我与他者”之间理想的关系样态（孙庆斌，2009）。

现代人的身份认同不仅是自我的主体建构，还是一个在不断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正确理解和对待“他者”和“他者的世界”的过程。随着20世纪人类社会冲突的加剧，基于各种利益冲突而形成的想象的“他者”问题正在不断放大，从萨义德的东方学到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都说明了对“他者”的想象是建构自我和身份的认同的关键要素。

在网络社会中，“他者”的冲突被进一步放大和加剧。个体主体对他者的理解，和群体主体对他者群体的想象，并没有因为网络社会中的信息流动而变得更加和谐和趋同。一方面，多元的主体被不断建构，另一方面，对立的他者不断被制造。虚拟和流动的技术逻辑正在涵化一种新的网络政治逻辑，这种政治逻辑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去主体化后虚无主义所带来的“主-客”对立的加剧。施密特（2004：106-107）认为，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

便是朋友与敌人的划分。“朋友与敌人的划分表现了最高强度的统一或分化，联合或分裂。它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独立存在，而无须借助于任何道德、审美、经济或其他方面的划分。”在网络世界中，个体和群体的主体性隐匿在虚拟传播技术之下，“非友即敌”的“斗争”思维常出现在冲突化的他者身份的制造过程中，并在短时间内迅速制造出高度的统一或分化，而这种短暂的集聚往往没有稳固的根基，上一秒的“朋友”随时可能由于趣缘、迷群的分化而变为“敌人”，这种表面的一致性更多是情感的短暂共鸣，而非富有持久性的意义经验认同。同样以“百度贴吧”为例，“爆吧”成为一种常见的网络现象。“爆吧”从其表现来讲，属于典型的网络暴力行为，主要是指在贴吧内不停地发无实质内容的废贴、水贴、垃圾贴等，扰乱贴吧秩序。在各类“爆吧”事件中，“他者”化的冲突不断放大。网民根据各自所属的虚拟群体身份定义“朋友”与“敌人”，最终汇聚为人格化的虚拟群体之间的“他者”对立。

表面上看，类似“爆吧”的行为事件并没有付诸现实行动，只是一种在网络上制造垃圾水贴的行为。但不容忽视的是，愈来愈频繁的“爆吧”事件，反映出在网络空间中，他者化冲突不断加剧所带来的认同危机。在现实生活中可能相安无事的网民，在网络空间中却彼此抱团，形成新的“党同伐异”。网民通过“制造”共同的敌人，形成想象的虚拟身份认同。这种情绪化、非理性化的他者想象，指向的矛头对象其实并不具体，除了短暂的情绪宣泄，并不利于不同群体之间的彼此对话，表达理性和交往理性更是无从谈起。

这类冲突加剧的背后，体现出技术的“去主体化”传播所导致的自我身份认同与他者认同的随机和模糊。由于不能清晰的界定网络世界中的自我身份，他者的敌友身份也不再泾渭分明。将他者视为“非友即敌”的现象，说明在身份认同中具有稳定性、团结性的社会共识正在被不断消解。网络空间中所弥漫的“站队”意识，也在提醒我们，在虚拟和流动的网络社会中，化解自我与他者之间想象的冲突，对于一个良性互动的共同体至关重要。

### （三）解构文本：流动的意义与价值

在主体身份的消解和他者冲突加剧这一互动过程中，意义的共享与价值判断也随之发生变化。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是一个创造经验、生产知识、形成社会文化，并最终塑造社会意识形态的过程。通过这种持续不断的意义共享与价值判断，人们基于不同的身份认同创造形形色色的人类共同体，彼此之间相互协作或抗衡。

语言是产生意义共享的直接手段和方式。查尔斯·泰勒（2001：48-49）认

为，自我存在于某种语言中，或部分地由这种语言构成。作为自我的一个关键特征，语言只能在语言共同体中存在和得到保持。对“我”说来是最初的那些关键词的意义，它们之所以有意义是对“我们”来说。对话的关键特征是相关性，在谈论某个事情时，你和我使之成为我们共同的客体。

泰勒在这里所指的语言，不仅包括日常语言，还包括一种有关道德和精神境遇的“语言”，亦即作为意义共享的文本（text）和语境（context），它们构成为自我的人格要素。在大众社会中，人们通过大众传播塑造的文本和语境进行自我与他人的意义交流和分享，形成与自我和他人身份认同有密切关系的信仰、观念、认知经验和集体记忆。在网络社会中，人们同样通过网络空间中弥漫着的各种文本进行人格化的意义建构，作为一种认同性和抗争性文本，“网络语言”正是这种意义建构的代表。在这种文本建构过程中，形成了与以往社会认同颇为不同的一套符号体系，网络流行语与表情包即是例证。

例如，表情包通过刻奇（kitsch）式的符号创作，追求刻奇戏谑化后的意义错乱和无序，从而产生去宏大、去本质和自我消解式的意义和价值抗衡。表情包用游戏化的手段迎合了新生代网民们对符号的快餐式消费，在制作传播过程中迎合低级趣味，用鄙俗化的手法制造媚俗文化效果。在表情包的拟仿、复制、盗版和传播过程中，作为意义共享的文本和语境遭受双重解构（吴志远，2018）。

另一方面，自我通过身份认同，基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经验、认知理解程度、情感好恶对事物与他人作价值判断。每当个体之间形成利益冲突时，这种价值判断的诉求就会急剧高涨，并通过彰显身份认同的行为，形成具有内部高度价值一致的共同体。斐迪南·滕尼斯（1999：257）认为，共同体是结合的本质意志的主体，而社会则是结合的选择意志的主体。<sup>2</sup>共同体的任何关系在结构上或者按其本质的核心，是一种更高的和更普遍的自我。（滕尼斯，1999：255）身份认同过程中的意义共享和价值判断正是构成这种“更高和更普遍的自我”的重要方式。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网络社会中的意义共享与价值判断呈现出更为后现代意义的解构性。道德语言和精神境遇多元而又分散，网络社会一方面呈现出高度集聚的时空效应，另一方面又呈现为极度去中心化和原子化的传播样态，在意义庞杂多元的社会结构和传播关系中，身份认同的意义共享与价值判断既缺乏传统社会中仪式性的坚固和持续，同时也缺乏工业社会中科层化的整齐有序和统一。

在流动的意义与价值之河中，网络社会中的身份认同表现出意义共享的随机、

无序，以及价值判断的去中心和去本质。这使得网络社会中基于身份认同而建构的共同体本质意志被大大削弱，基于身份认同而形成的共同体变得更加多元，同时也更加离散（dispersed）。另一方面，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变得不牢靠和不稳固，成员的构成也越来越分散和多变，所形成的“共同体的人格”则更为小众化<sup>3</sup>。

因此，在网络社会中，社会成员的意义共享和价值判断充满了流动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体现了身份认同的多样和随机。流动而又离散的身份认同正在解构着过去被视为极为稳固的社会概念和观念，其中，国家认同也正经历着消解和重构。

## 二、宏大与变调：国家认同的模糊

尽管我们说互联网让世界的概念缩小了，世界各地已经结成为利益攸关的共同体，跨国公司遍布全球，网络和新媒体更是让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之人可以“近在咫尺”的沟通联络。但毋庸置疑，国家依然是今天最重要最权威的国际行动主体。对于普通人而言，国家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直接空间（无论是物理空间意义还是社会空间、政治空间意义上），一个人无论持怎样的政治主张或有何种社会观念，国家概念及对国家的认同都是其潜意识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全球化以来，世界范围的国家认同都产生了直接的变化。全球化被视为是构成现代国家认同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伴随全球化产生的互联网技术正在让人类社会步入网状结构的网络社会，由于网络社会去中心化的传播结构和网络社会成员多重身份的转变，从今日世界各地的政治实践来看，网络社会已经在影响现代人的国家认同，这在进入新世纪以来一系列的国际重大事件中都得到了经验验证：信息的快速流动会导致认同和利益的重大变化，传统宏大叙事式的国家认同话语体系正在不断被消解，这其中有新世纪以来全球政治格局变迁、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发展等诸多因素，但毫无疑问，以互联网和新媒体为代表的新传播技术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驱动力。

### （一）从“去中心”到“去权威”

从认同政治的角度说，国家认同是具有差异性族群成员通过相互承认结成“国家”这种政治共同体作为自己情感和身份归属的自觉认知。国家认同是一种具有政治性、普遍性、理性选择的一种认同形式。（周光辉，刘向东，2013）

“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既是一个政治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地理概念、文化概念和历史概念。卡尔·施密特（2004：99）指出，“国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

提。按照现代语言的用法,国家是在封闭的疆域内,一个有组织的人群拥有的政治状态。”对现代国家的认知和理解,涉及到对国家基本属性的认知,包括疆域、文化和国家利益等;还涉及到对国体、政体等政治制度的认同;同时,还涉及对民族国家的理解,即,是认可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还是多民族构成的国家。

国家认同即是社会成员共同建构国家概念的一种政治动员。自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成为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动员工具和活动场域。不妨重温一下沃尔特·李普曼(2006:3)在《公众舆论》开篇中叙述的案例:

大洋中有一个岛屿,1914年时,那里住着几个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岛上不通电缆,英国邮轮每60天来一次。到了9月,邮轮还没来,这些岛民谈论的话题仍是最后那期报纸报道的即将对卡约夫人枪杀加斯东·卡尔梅特一案进行审判的消息。因此,9月中旬的一天,他们抱着非同寻常的急切心情全部涌向码头,想听那位船长说说做出了什么样的裁决。但他们得知,6个星期以来,英国人和法国人为了协约的尊严正在同德国人作战。在这不可思议的6个星期中这些岛民仍像朋友一样相处,而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了敌人。

20世纪是大众传媒型塑和控制意识形态的时代。通过大众传媒,不同的政党得以通过宣传手段建构人们对国家的强烈认同。无论是在领土争端、国家利益的诉求问题上,还是在具体的国体、政体建构与民族国家统一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了构建国家宏大叙事的重要工具,使国民认同现代国家的唯一性与权威性,承认和支持国家高于个体,主权大于一切。

李普曼在他的故事里埋下了一个不经意的小小伏笔——“岛上不通电缆”。在一个依赖报纸作为大众传播工具的时代,人们的意识形态同信息的及时或滞后有着巨大的关系,电子媒介则打破了这种时空的区隔,也让禁锢的意识形态得以重塑。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更是开始对传统国家认同的宏大叙事结构进行重组。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进一步渗透,去中心化的网状社会结构正在重构虚拟社会中有关国家的相关内涵。国家、社会的主从力量格局在互联网上发生了醒目的逆转,社会正在被重新发现,并且逐渐拥有了权力内核、政治信心、自我认同,其反客为主、附庸蔚为大国之势已十分明显。(杜骏飞,李永刚,孔繁斌,2015)这种由网络技术所带来的社会政治动员的改变,被凯斯·桑斯坦预言为一个“网络共和国”的诞生,以及伴随其产生的一套新的政治行动逻辑。人们一方面将



现实的政治议题纳入互联网中进行讨论,另一方面,同时也在互联网上进行与传统国家议题有关的新的设计。相比较大众传媒建构了宏大叙事化的国家认同,网络的技术逻辑则让这套宏大叙事去本质化、去权威化。网络社会的去中心化技术特征,大大削弱统治体对国家认同核心内涵的建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日益形成,社会力量在网络政治动员上拥有了更多的优势,国家的政治动员能力反而在草根权力的戏谑、调侃与集群抗议中逐渐衰减(杜骏飞,李永刚,孔繁斌,2015)。

去中心化的社会动员使国家认同的建构不再以统治体或政治团体为绝对主导,传统国家认同问题中最核心的领土、主权<sup>4</sup>、国家利益问题,在互联网上,让位于更具普适性的自由、民主、平等等议题,网络社会正在为人们建构一套新的国家认同标准。

但同时,伴随着去中心化带来的“网络民主”的可能,“去中心”的技术逻辑也正在逐渐导致国家认同中的“去权威”。权威是国家和社会共同体赖以维系的一种秩序性力量。权威不同于强权或极权,它体现了国民或共同体成员对于国家和共同体的基本认同,它不需要强制性,而内化在认同的自愿性中。认同国家的权威,也即在自我与国家的关系中,承认国家的先行性和至关重要性,愿意服从国家为中心的秩序建构。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过程中,国家权威性的塑造来自于不同的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和技术逻辑。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国家权威通过自上而下的等级制、限制性的农业经济制度和受严格控制的传播技术来塑造。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国家权威来自于对政体的认同、自由而竞争的商业体系和中心式的大众传播技术和大众文化的塑造。在网络社会中,去中心化的技术逻辑冲击了传统的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信息化和全球化作为两把双刃剑,与互联网技术一起作用于人们对国家权威的认同上,使个体与国家之间传统的顺从关系和依附关系逐渐被淡化。

权威性的淡化,使网络社会中国家认同的宏大叙事结构被消解。网络空间作为“第五疆域”<sup>5</sup>对国家的安全至关重要,然而,在网络空间中,国家的概念脱离了中心化的技术传播手段,遭受不断冲击和稀释。国家意识的淡漠是网络社会中国家认同亟待解决的认同危机,在诸多有关国家团结发展的集体性事件中,国家权威性被网民们以戏谑化的方式进行恶搞和调侃,网络空间中的国家认同正在丧失其原有的凝聚性和崇高性。例如,在“帝吧出征FB”这一场看似热闹的集体行动中,传统的国家权威性反而被网民用段子、表情包和刷屏洗版的戏谑行为所解构了。权威性消逝的同时,取而代之的是情感化游戏的实践方式(王喆,2016)与集体的互动仪式

表演（刘国强，2016）。

## （二）从“网络游民”到“网络公民”

如上所述，现代社会的国家认同是由具有差异性的族群成员通过相互承认结成的，国家认同离不开公民身份的建构。国家认同既是在建构“国家”，也是在建构现代公民身份。它是拥有不同社会心理、社会文化，属于不同族群的社会成员进行自我认定所属政治共同体的过程。

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公民，指具有某一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公民作为一个政治学概念，最初发源于古希腊城邦政治，亚里士多德（1995：113）认为：“凡是有权参加议事、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以说他是一城邦的公民。”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公民是一种政治参与权的身份体现。近代以来的公民概念通过启蒙思想家的一系列思想学说的阐释，与现代宪政理论结合在一起，它体现了现代社会对个体与国家之间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契约关系，它除了是一种政治权利的体现，同时也是现代社会人权的集中表达。卢梭（1996：7）认为，天赋人权是现代人的基本属性，“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放弃自由就是放弃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力”。斯宾诺莎（1999：219）认为，国家的政治基础是人的基本权力，同时，他认为个体的自然权利来源于国家的维护，“只有在人们拥有共同的法律，才谈得到人类固有的自然权利”。洛克（1964：6）则进一步将说明了这种政治契约关系，他在《政府论》中强调，“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都不得危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

现代公民概念与现代国家体系有直接关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三十三条）。法律意义层面的公民的首要属性是拥有本国国籍，这同政治学意义层面的公民有着较大的不同，前者强调国家的首要性，后者则强调个体的首要性。也就是说，现代民族国家体系通过法律契约将不同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的人以共同的国家这一命运共同体的名义集结在一起；而纯粹政治学意义上的公民主要是从权利与义务角度，探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法律意义上的公民与政治意义上的公民可作为网络社会中的公民概念的参考。一方面，网络社会并不是再造一个新的脱离民族国家体系的社会或空间，另一方面，在网络空间中，又很难区分网络使用者的国籍身份和政治身份。这对现代人的

国家认同造成一种两难的冲击：民族国家体系在网络空间没有绝对主导权，而政治权利与义务也不具有强大的约束性。这带来的问题是，在网络空间中，现代国家体系和政治体系对网络使用者都不再是最重要的参考体系，网络公民身份亟待被定义。

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梅丽莎·威廉姆斯（2011：32-33）将公民身份定义为，（a）在特定的共同体内旨在实现（b）共同善（common good）的一种新形式的政治行动，在该特定的共同体内，政治行动者主张他们（c）具有成员身份（membership）的地位。这些政治行动表达的是（d）公民的一种公共角色，这种公共角色是通过他们从事一系列（e）具有德性特征的（f）行动得到彰显的，在这里，德性是评价公民角色以及这些角色进行的活动是否称职的标准。

按照这个公民身份的定义，网络社会作为一种新的政治活动的场域和时空，正在诞生着形形色色的共同体，其中不乏新的公共角色和行动。但在这种新的公民身份中，共同善（common good）以及德性（virtue）仍需培养和建构。共同善和德性是共和传统和社群主义的重要理念，二者体现了共同体成员对公共利益的尊重和维护。对于共同体而言，它们是区分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另一种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范式 and 标准。对于当下的网络社会而言，技术逻辑带来两对新的矛盾亟需解决：其一是网络所带来的自由和解放需要与之匹配的权利与义务。其二是去中心的网络共同体和集群化的行动者之间需要形成与之匹配的社会角色和评价标准。

网络社会中的个人政治参与相比较以往，有了非同一般的突破。无论是世界范围内的各种互联网政治运动，还是在中国以微博等自媒体为代表的各种抗争性事件，都对现实社会中的政治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已有的研究证明，互联网的确在提升社区凝聚力、政治协商和政治参与方面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电子民主”（查德威克,2010：109），但这种“电子民主”是否已经孕育出“网络公民”，尚可存疑。通过互联网，我们看到了群体动员的力量，但同时也看到乌合之众打破一切的决心，在群众性网络冲突中，充斥着谩骂、人身攻击、人肉搜索、道德审判、审丑戏谑、群体狂欢等各种毫不尊重权利与义务的行为。

麦克卢汉（2011：75）认为，“经过三千年专业分工的爆炸性增长以后，经历了由于肢体的技术性延伸而日益加剧的专业化和异化以后，我们这个世界由于戏剧性的逆向变化而收缩变小了。由于电力使地球缩小，我们这个地球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村落。一切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都结合起来，以电的速度产生内爆，这就使人的责任意识大大提高。”在一个重归部落化的社会，“网络公民”的身份已经被

重新定义。但麦克卢汉所乐观认为的“人的责任意识大大提高”却尚未到来，就目前而言，我们尚处在网络社会的发展初期，人们尚处于一个网络游牧时代，“网络游民”们正在使用互联网和新媒体建构新的权力关系，形成新的国家认同。

根据CNNIC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统计报告，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51亿，相当于欧洲人口总量，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4.3%。其中，10-39岁群体占网民总体的72.1%，互联网继续向10岁以下低龄群体和40岁以上中高齡群体渗透。网民学历结构依然以中等学历群体为主，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网民占比分别为37.9%、25.5%。网民中月收入在2001-3000元及3001-5000元的群体占比较高，分别为15.8%和22.9%。<sup>6</sup>由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未来网络会继续向每一个人普及，同时，我国网民低龄、低收入和低学历的状态会在很长一个时期持续。如果中国社会经济能够继续保持稳定发展，中产收入人群应该成为网络上的主要参与者。也就是说，年轻人和中产阶层将是未来网络社会的中坚力量。

这些群体已经在主导今天中国互联网和社会中的诸多事件进程。他们一方面在互联网上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性，另一方面其行为也充满了不确定性、盲目性甚至存在一定的极端化。在涉及到国家认同核心议题的国家统一问题上，青年群体积极参与政治，但其行为却迥异于以往的政治动员。“帝吧出征FB”的行动中，内地青少年参与者在民进党主席、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以及《苹果日报》、“三立新闻网”等媒体的Facebook主页发布了海量的“反台独”言论和“反台独”图片、表情包，制造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刷屏”（“洗版”）效果，也震荡出颇为浩大的舆论声势。在台湾“太阳花运动”等群体性事件中，青年更是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积极开展“反中”性质的政治运动，走向街头，包围权力机构、阻塞交通，成为街头政治、民粹政治的主力军（马锋，2014）。两岸青少年在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都表现出对待国家认同等议题的民粹化。

网络社会有利于公民获取信息，加强沟通和联络，发表不同观点和意见。但在当前的中国互联网生态环境中，公民角色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在微博等诸多自媒体公共空间中，理性讨论也时常是缺位的，草根化、民粹化成为网络社会中的流行传播方式，公共事件的公共性通常会被彼此离散的网民通过情绪化的网络动员建构为一种“弱者的武器”，从而形成一种“私民”的网络“狂欢”。网民的行为规范并未真正遵从公民社会中公民应有的权利和义务。“网络游民”们何时可以成长为真正的“网络公民”，对于建构一个健康的网络社会环境意义重大，也决定了网络社会中国家认同从内涵到实践的长远发展。

### 三、想象与连接：民族认同的离散

国家认同体现了现代社会中，公民对于国体、政体的认知和认同，表现了一个社会中，政治共同体构建的可能。民族认同则集中体现了个体与社会共同体对“同一性”的追求，这种同一性表现在对本民族的归属和认同，以及对外族的合作或抵抗。相对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其实更为复杂：在一个单一民族的政治共同体中，民族认同可以和国家认同上升为一体，而在一个多民族的政治共同体中，民族认同则既有文化因素的族群认同，也有政治因素的国族认同。国家认同的主体是人民（公民），民族认同的主体则是不同族群，国家认同的客体是国家（国体、政体），民族认同的客体则是民族（文化性、血缘性）。民族认同的直接表现，是民族主义在全球的发展和扩散。

#### （一）由“中介化想象”到“超域化连接”

民族主义是个体、族群在发展过程中，通过追求同一性来建构自我与他者想象的过程。因此，民族主义具有对内和对外的双重属性。对内而言，民族主义表现为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价值观的认同、共同的历史认同和政治认同。对外而言，民族主义表现为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合作交流、冲突矛盾。民族主义的这种天然的内外双重属性，使得其在建构的过程中，总是在与外族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吸收和发展本民族认同的核心内容。在这一过程中，民族融合与民族分裂也时有发生。从人类的历史发展趋势来看，融合应该是主流，分裂和对立不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自19世纪以来，现代民族认同以民族主义的形式陆续在世界各地集中上演。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观点，民族主义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而这种“想象”之所以可能，与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安德森引入本雅明关于“同质的、空洞的时间”的描述，以小说和报纸为例，分析认为，现代人的时空观受大众印刷媒介“想象的关联”的激发，“一个穿越时间的稳定的、坚实的同时性（simultaneity）概念对于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有多么重要”，“即使是‘世界性的事件’也都会被折射到一个方言读者群的特定的想象之中。”（安德森，2005：60）在资本主义和现代大众传播技术的推动下，形成现代认同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共同体形成并得以扩散。

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着族群之间的融合和分离。自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概念才逐渐成为融合多民族共同前进发展的一个现代民族主义概念。梁启超是这一概念的首倡者。通过报刊等近代大众传播技术，先进的中国人开始集聚对中华



民族的认同基础。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于《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也郑重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而真正使中华民族概念深入人心,成为现代中国民族认同“多元一体”的基础,还要通过近代中国在抵御外敌过程中所集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价值观上的全民认同。抗日战争,救亡图存让中华民族意识走向全民觉醒。进入新中国以来,中华民族成为建设新中国,团结中华多民族力量的重要认同概念。对内,追求各民族的统一发展,共同繁荣富强;对外,求同存异,通过和平发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这种对内凝聚、对外自强不息的特征体现出各族人民对“求同”的追求。“求同”化的民族认同除了与当代政治经济的一体化和全球化有关,也与大众媒介技术的传播扩散有关。大众传播技术为分散在各地的人们创造了共时性的重要心理体验,让不同地域的族群之间建立了彼此命运同共的社会认同。互联网技术则让每一个人以信息节点的形式分散在网络的不同信息单元中。如果说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现代人塑造了工业时代“想象的”民族认同意识,互联网技术则让现代人建立了直接的中枢神经“连接”。网络社会的网状社会结构与“超域化”的时空特征,正在逐渐取代大众传播技术的“中介化想象”,这种去中介化的直接连接,让每一个个体可以直接观看和参与到民族主义运动的现场。

网络社会的“超域化”特征,是现代性的进一步延伸。吉登斯最早指出了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时空分离”,在现代技术的推动下,现代人的行动正在逐渐摆脱场景的束缚、时空分离进而导致了“脱域”。所谓“脱域”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关系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吉登斯,2011:18)。吉登斯通过“脱域”这个概念说明时空分离对于现代社会的影响,“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依然。”(吉登斯,2011:57)吉登斯总结现代社会的两种脱域机制为: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象征符号包括货币、权力和语言;专家系统则通过跨越延伸时空的方式进行脱域。而所有这些脱域机制都有赖于现代社会的信任机制的建立。

网络社会的技术特征不仅进一步分离了时空,而且还通过无限扩展空间,来消除时间对于稳固而又连续的社会的影响。时空的延展和压缩,使网络社会的社会关

系不仅脱离空间和时间的束缚，同时也超越了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

这种“超越脱域机制”的技术逻辑使现代民族认同建构过程中赖以维系的象征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被解构。大众媒介建构的民族共同体的象征符号系统不再具有共同想象的社会心理基础，过去为专家和精英所垄断的话语系统也不复存在。

这种“超域化”的技术逻辑还在削弱民族认同的文化、历史根基。作为一项更加偏向空间的技术，互联网技术让信息在空间范围内有了无限到达的可能，但同时又让信息在传播时间上更加平行和短促。信息每时每刻都在经历迭代，这种“转瞬即逝感”使民族认同所需要的文化、历史和传统不再稳固。因此，在网络空间中，民族主义时常爆发成短暂的来自“四面八方”的集体行为，但却缺乏历时性的传承和发展。这种去中介化的直接连接，使人们不再需要大众媒介建构的崇高而又美好的想象。新技术所带来的转瞬即逝的时间“逼促感”，要求每一个参与主体都必须时刻“求新”“求异”，以适应这种高度压缩的网络时空关系。

“表情包”作为一种新的民族主义话语武器，就是这种“求新”“求异”的表现。在传统民族主义的动员过程，标语式的口号可以团结大众，为大众建构民族主义象征符号的社会想象。例如，具有民族象征意义的文字符号、视觉符号和歌曲，都可以充当具有神圣凝聚力的动员方式。这些象征符号不仅能够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还相当具有情绪的感染力，在认知和情感多个层面引导民众的民族认同。“表情包”式的民族主义则以戏谑、拟仿、盗版的形式，在短时间内引爆某个议题，通过游戏化的参与方式，仿造一系列没有价值内核的“民族主义”符号系统，并将这套符号系统的象征意义引向民族认同的虚无主义，即一切都可以游戏、一切都可以恶搞、一切都可以狂欢。

这种没有精神内核和价值内涵的“民族主义”游戏，看似“求新”和“求异”，实则并没有真正的创新，它只是在不断重复和放大民族认同中的狭隘的自我盲目性和排他性，最终也必然会导致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

## （二）由“中心扩散”到“圈层离散”

网络社会是一种点对点、散落分布的社会结构。每一个节点既是信息的中转单元，也是信息的源头。大众传播技术的中心辐射式的传播结构，有利于民族主义自上而下的动员和扩散，这种“涟漪式”的传播结构有助于形成上下一致，具有共同目标和追求的民族认同。而在网络社会中，个体处于一定的圈层之中，中心式的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正在被点状圈层式的传播结构所替代。不同于过去民族认同对共同的地缘、血缘和文化历史的强调，个体通过不同的圈层建构自己的民族认同感，

这种民族认同通常基于共享的趣缘、话题和平台（贴吧、微博、微信等不同平台）而聚合为一体。

分散的个体在网络社会中通过兴趣小组的形式随机聚合在一起。趣缘成为共同体形成的直接契机和形式。以近年来网络上的民族主义事件为例，这些网络民族主义事件并没有发生在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族群社群中，而是以各种贴吧兴趣小组的形式爆发。这些趣缘小组的成员将此类行为称之为“圣战”，然而所针对的对象却多半是艺人明星等娱乐性对象。

例如，2007年，杨丞琳因为在很多年轻网民看来不够“爱国”，被认为没有按照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具有“民族荣誉感”，来自其他不同趣缘贴吧的网民集体对“杨丞琳吧”进行爆吧。类似的事件还有“东方神起吧”事件、“6·9圣战”以及近年来让世界瞩目的“帝吧出征FB事件”。这些基于趣缘而形成的共同体与血缘、地缘民族共同体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其带有表演性质的民族认同背后，真正的族群意识已经让位于娱乐意识。民族主义成为这些趣缘小组发起对异己性的“他者”的攻击武器。没有什么比民族主义更适合拿来作为其行动和目的合法化的工具。这种对民族主义的滥用，恰恰消解了民族主义的合理性，使所谓“网络民族主义”成为网民集体非理性行为的合法掩护。

因为没有真正的民族认同诉求，在这种圈层化的传播结构中，话题性就成为一个个引爆民族主义的导火索。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话题，被制造为他者的对立和冲突。在消费这种冲突性民族主义话题的过程中，网民彼此间的信任体系被进一步打破，凝聚性的认同力量在减弱，而离散性的自我意识在不断加强。基于不同的趣缘属性和话题特征，个体在不同的圈层化传播过程中形成强烈的自我认同意识，不同群体之间形成排斥对话和交流的传播氛围。这就导致了每当此类网络民族主义事件发生时，群体极化现象一定是伴随产生的，因此，冲突也在不断加剧。最终将导致一个个彼此离散而又封闭性的圈层化传播生态。

民族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扮演过重要的团结族群、团结社会的力量。虽然在近代以来人类的各个历史时期，民族主义天生的排他性和对立性也总会导致危险的民族关系和国际冲突。但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来看，一个开放的民族才能与其他民族共存共荣。网络社会应该是人类进入更加自由和平等的一个发展阶段，但去中心化的技术逻辑也隐藏着新的风险和隐患，当分散的点聚合为一个个封闭的圈时，是时候思考如何在这些圈之外寻找构筑通往现代认同的共识桥梁和基石。

#### 四、重建网络社会中现代认同的基石

综上所述,网络社会的技术逻辑正在重塑现代人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双重身份认同,并将建构虚拟群体的身份认同。这些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转变,将导致网络社会中个体与群体迥异于工业社会的行为逻辑。传统宏大叙事结构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也将极大的受到这种技术逻辑的冲击。技术逻辑可以成为政治逻辑发生的催化剂,正如蒸汽机、火车之于工业时代的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的重要意义,互联网技术绝不仅仅是一种通讯工具,它还内嵌了个人社会化和群体分化的技术逻辑,它将进一步改变人们认知自我和他者世界的意义和经验。因此,对待网络社会及其背后的技术逻辑,现代社会应该重拾和修复与之相匹配的认同基石。我们认为,有三大基础性的社会体系需要适应新的技术逻辑加以重建修复:

##### (一) 对话和信任体系

首先需要面对的是网络社会去主体化后导致的虚无主义问题。现代社会的虚无主义问题早在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就已开始兴起。它表现为现代人对自我、对他者、对世界的去本质化和去真理化。这种虚无主义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个人主义打破了一套神圣秩序,但同时也走向了自我的极端;工具理性成为评价世界的首要尺度和标准,技术理性凌驾于人的价值之上;现代人的政治生活也走向了自我的、封闭的“自由化”时代;文化上,一种极度自恋化的文化使个体在放大“个性”的过程中,失去“灵性”和创造性,走向消费主义的麻木和空洞。马克思(1995:252)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经典批判依然振聋发聩:

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他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情、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

现代性的虚无主义在现代技术的催化下进一步侵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体系。在后工业时代,维系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传统观念、道德信仰遭受着颠覆和冲击。大众传播技术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但也带来了新的心理距离。互联网技术则再往前进一步,它让远在天边的陌生人成为近在屏幕前的他者,也让近在咫尺的身边人,成为虚拟匿名化后的陌生人。传统社会中的人际交往关系在网络世界中遭遇着“倒置”“错乱”,它打破了传统的亲密关系,又提供一种陌生人工具化的

交往情境和方式。在这种工具化的交往行动中,感性凌驾于理性之上,主体淹没于“比特”之下,意义不断去本质、碎片化。

技术理性打破了传统的交往方式,去主体化的交往关系导致社会共识消解、价值参照体系的混乱,进而加剧了人和人之间的疏离感。正因如此,哈贝马斯提出了构建交往理性的重要性,交往理性的首要前提是必须克服主体主义和去主体化后的虚无主义,实现“主体间理解的一致性”(哈贝马斯,2002:28)。哈贝马斯强调,

我们必须还‘自我’以主体间性的意义。任何人都不能单独地自由存在;没有与他人的关联,任何人都不能过一种有意识的生活,甚至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没有人能成为仅属于自身的主体。现代性的规范内涵只有在主体间性的标志下才能被解读。(吴育林,陈水勇,2011)

在互联网技术创造了虚拟身份的过程中,“他者化”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他者化的冲突使网络空间缺乏对话机制,进而导致了网络社会中信任体系的颠覆。在缺乏对话和信任体系的环境中,主体很容易在虚拟空间中成为没有自我意识的网络暴民。主体根据趣缘化的认同结成不同社群,当与其他社群发生冲突时,不会诉诸理性对话、寻找共识,而是采取诸如“爆吧”“网络围观”这样的网络暴力形式“解决问题”。因此,要改变这种“党同伐异”的思维和意识,必须重建网络空间中的对话和信任体系。

## (二) 互惠和合作体系

在修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对话和信任体系的过程中,还要重构不同群体之间的互惠合作体系。人类同处于一个地球村,互联网则让世界重归部落化,互惠合作是未来网络社会发展的题中之意。2015年12月,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曾强调,互联网是人类的共同家园,各国应该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推动网络空间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为开创人类发展更加美好的未来助力。习近平提出了五点具体主张:第一,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第二,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第三,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第四,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第五,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sup>7</sup>

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看,只有互利互惠、加强合作,才能不断促进社会的进步和繁荣。网络空间中诞生了大量基于不同社会认同而建构的共同体,它们



彼此之间难免会因为价值多元而产生矛盾冲突，如何调和这些分歧和矛盾，创造一个健康有序的网络世界，需要个体、社群和不同国家的共同努力。虽然互联网建构了大量不同的群体，但这些群体之间的交往互动方式往往是以强化自我的群体认同和利己主义居多。因此，在未来的网络社会发展中，一种健康的“网络社群主义”（Cyber Communitarianism）更值得提倡和发扬。

社群主义以共同善（common good）为前提，以互惠为目标，以合作为手段，可以修补分歧，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社群主义是对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极端个人主义、道德利己主义的回应。在“权利”与“公益”的矛盾问题上，自由主义更强调权利，而社群主义则提倡共同善（common good）优先于个人权利，个人离不开社群的组织和合作。网络空间是一个相对自由的世界，但自由不代表没有秩序。在价值多元的网络空间中，应该构建以共同善为目标的空间秩序，强化互惠的精神，促进多元合作的可能。

### （三）公共和权威体系

相比较于大众传播时代，互联网使每个人获得自我代言和发声的机会，但也伴随着产生了对公共性的消解和传统社会单元权威性的稀释。表面上看，互联网技术实现了更多公共化（public）的可能，但公共化不代表具有公共性（publicity）。阿伦特（1999：38）认为，“公共”（public）一词，“首先意味着，在公共领域中展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为人所见、所闻，具有可能最广泛的公共性。”在网络社会技术化的实现了形式上的公共化后，公共性应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更高的追求。

事实上，今天的网络空间尚处于一种公共空间（public space）阶段，与哈贝马斯意义上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依然相差甚远。在信息公开化、公共化的网络空间中，对个人空间和私人领域不负责任的肆虐入侵却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人肉搜索”、“道德审判”等现象即是这种技术逻辑之下产生的公共化难题。在缺乏系统的公共性讨论和训练之下，民众的公共行为极容易陷入“公私不分”的悖论中，最终将导致现代认同建构过程中公共性的混淆、公民身份认同的缺失。

另一方面，互联网的技术逻辑也在消解着民族国家的传统叙事结构，传统权威体系在离散化的个体性力量的对冲下，被去宏大、戏谑化的解构。在一个权利越来越无限制的放大，更加自由化的空间中，如果缺乏具有向心力的权威体系，必然会导致原子化的个体走向民族国家认同的虚无主义。因此，网络社会亟需重建新的公共和权威体系，建构一种适应网络社会结构和技术逻辑的社会契约关系，使网络使

用户自觉的意识到网络公民身份的行为要求和准则，为团结凝聚的民族、国家认同创造基石。

（责任编辑：吴欣慰）

### 注释 [Notes]

1. 卡斯特认为，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虽然社会组织的网络形式已经存在于其他时空中，新信息技术范式却为其渗透扩张遍及整个社会结构提供了物质基础。此外，网络化逻辑会导致较高层级的社会决定作用甚至经由网络变现出来的特殊社会利益：流动的权力优先于权力的流动。在网络中现身或缺席，以及每个网络相对于其他网络的动态关系，都是我们社会中支配与变迁的关键根源，网络社会的特征在于社会形态胜于社会行动的优越性。（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569页。简·梵·迪克则认为，网络社会的概念强调的是信息传递的形式和结构，它预示着社会和媒体的深层网状结构。因此，一个网络社会可以看作是一个在个体、群体和社会等各个层面上都以网络为社会和媒体的深层结构的社会。进而言之，不论是个体的，群体的还是组织的，其要素都通过网络联系在一起。在西方社会，个体已经成为网络社会的基本的网络连接要素，在东方社会，这些被网络连接的仍是群体，如家庭、社团和工作组织。（荷）简·梵·迪克：《网络社会——新媒体的社会层面》（第二版），蔡静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页。
2. 滕尼斯认为，本质意志是指：一个人或一群人自身所拥有的作为属于他或他们力量的东西的总和，只要这些力量是一个统一体，它的各种主体通过记忆和良知使所有它们的状况以及对内对外的变化与自己相关联，感到是与自己相结合的。而选择意志则指：包括一个人是什么和一个人拥有什么的一切，只要他通过他的思维决定着它们的状况和变化，他理解它们是依附他的思维的，他在他的意识里掌握着它们。（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和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57页。按照滕尼斯的划分，本质意志表现为意向、习惯、回忆，它与生命过程密不可分。在这里，手段和目的是统一的，靠本质意志建立的人群组合即“社区”是有机的整体。“社会”是靠人的理性权衡即“选择意志”建立起的人群组合，是通过权力、法律、制度的观念组织起来的。
3. 举例来说，一款网络游戏“魔兽世界”就可以形成百度贴吧中的“魔兽共同体”，它们的成员多元分散，从传统身份认同的角度说，这群人在现实生活中相遇也许根本没有任何身份认同的可能，更遑论缔结这样的共同体，这样去中心化的共同体，其成员在社会行动上可以实现瞬间的集聚和高度统一，但又会随事件结束而瞬间消失。多年前的“铜

须门事件”即是这样一个网络游戏共同体的行动后果。

4. 正如小约瑟夫·奈指出的,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使得协调工作比较容易,并且增强了人权活动家的力量。但是,政治领导人,特别是原先属于殖民地的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坚持维护合法主权和抵制外来干涉。国家主权与正在兴起的人权规范之间的紧张关系,今后还将长期存在下去。他同时也认为,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主权国家继续存在,而是主权国家的中心地位和功能正在怎样被加以改变。(美)小约瑟夫·奈、戴维·韦尔奇:《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解与历史(第九版)》,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36页。
5. 所谓“第五疆域”,即在传统“海、陆、空、天”物理疆域之外的网络虚拟空间。
6. CNNIC:《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统计报告》,2017年8月, <http://cnmic.cn/hlwfzyj/hlwzbg/hlwtjbg/201708/P020170807351923262153.pdf>, 2017年8月。
7. 新华网:《习近平就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出5点主张》,2015年12月16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2/16/c\\_128536396.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2/16/c_128536396.htm), 2015年12月16日。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安东尼·吉登斯(1991/1998)。《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安东尼·吉登斯(1990/2000)。《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 安德鲁·查德威克(2006/2010)。《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任孟山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91/2005)。《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巴鲁赫·德·斯宾诺莎(1883/1996)。《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查尔斯·泰勒(1989/2001)。《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 杜骏飞、李永刚、孔繁斌(2015)。虚拟社会管理的若干基本问题。《当代传播》,(01), 4-9。
- 斐迪南·滕尼斯(1991/1999)。《共同体和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汉娜·阿伦特(1958/1999)。《人的条件》(竺乾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卡尔·施密特(1963/2004)。《政治的概念》(刘宗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刘国强(2016)。作为互动仪式的网络空间集体行动。《国际新闻界》,(11), 114-128。
- 马锋(2014)。从台湾“反服贸学运”看网络的社会动员。《中国青年研究》,(12), 74-78。
- 曼纽尔·卡斯特(1997/2003)。《认同的力量》(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梅丽莎·威廉姆斯（2011）。命运相连的共同体内作为能动因素的公民身份（丁开杰译）。

载斯蒂文·伯恩斯坦、威廉·科尔曼（主编），《不确定的合法性：全球化时代的政治共同体、权力和权威》（第32-3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马歇尔·麦克卢汉（1964/2011）。《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让·雅克·卢梭（1958/1996）。《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孙庆斌（2009）。从自我到他者的主体间转换——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走向。《理论探索》，（03），35-38。

沃尔特·李普曼（1922/2006）。《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吴育林、陈水勇（2011）。交往理性视阈中的价值共识。《学术研究》，（01），24-30。

吴志远（2018）。“图像武器”：“表情包”的话语与意蕴。《新闻界》，（03），47-54。

王喆（2016）。“今晚我们都是帝吧人”：作为情感化游戏的网络民族主义。《国际新闻界》，（11），75-90。

亚里士多德（1950/1995）。《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约翰·洛克（1964/1996）。《政府论》（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俞吾金等（2002）。《现代性现象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周光辉，刘向东（2013）。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及治理。《中国社会科学》，（09），40-5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0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95）。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